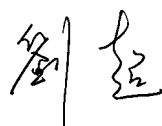


日本大學的成敗之鑒



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敗，直接關乎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崛起。歷史地看，大學的崛起，就意味着「大國的崛起」；哪裏有了一流的大學，哪裏就已經或即將出現一流的國家。環顧全球，迄今只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建成了國際公認的一流大學；易言之，還沒有任何世界一流大學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但是，「未出現」不等於「不需要」。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處此慘烈的國際博弈中，如果長期都不能擁有自己的傑出大學，那是難以想像的。

在現代社會，大學成為知識創新的主要陣地，也是高端人才最主要的搖籃。最早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出現於意大利，而意大利則是文藝復興的重鎮。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先後崛起，成為世界大學的典範，日後的工業革命則打造了一個「日不落帝國」。十七世紀，巴黎大學突飛猛進，日後啟蒙運動的中心便在巴黎。

在普法戰爭中慘遭敗北的普魯士，在戰敗陰影中埋頭苦幹，創辦了洪堡大學。德國高等教育很快領跑於世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大學仍在全球遙遙領先，以至於當時很多留學英美等國的中國青年(如陳寅恪、羅家倫、趙元任等)最終都要到柏林學習交流一番才算滿足。在二戰前的39屆諾貝爾獎中，有39位得主為德國人，佔總數的30%強^①。然而，1930年代，希特勒政權推行反猶政策，破壞學術自由，嚴重創傷了德國的文化生態，近半數學術精英迅速流失。德國大學在二戰中遭受毀滅性打擊，地位一落千丈，基本淡出了全球頂尖大學的名單。

美國在德國人才流失中大發橫財，取代了後者在科學、思想和文化上的領軍地位。在二戰前幾十年中，美國只有18人獲得諾貝爾獎，全球只有3位諾貝爾獎得主赴美工作；可二戰後四十年間，美國就有135人榮獲諾貝爾獎，全世界共有20個國家的45位諾貝爾獎得主移步美國大學^②。美國大學能夠得到這一突破，當然也離不開此前自身「修煉內功」的過程，其最重要的起飛階段，則是十九世紀的後四十年。這與美國在南北戰爭後的社會發展幾乎是同步的^③。早在1870年代，美國大學與日本大學幾乎同時開始了學習德國大學的歷程；但不同的是，美國大學有更多的原創因素，也就更為成功。經過綜合創新，美國大學幾乎融合了以前大學的一切優點。在1910年代，美國主要名校都發展為新興的近代化大學，其中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成為著名的「鐵三角」，同時還

歷史地看，大學的崛起，就意味着「大國的崛起」。環顧全球，迄今還沒有任何世界一流大學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長期都不能擁有自己的傑出大學，那是難以想像的。

湧現了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等後起之秀。由於大量科學家移民到美國，美國迅速結束了長達近百年的留德熱潮，開始形成相對健全的、有競爭力的模式，並成為各國學習的榜樣。經過七八十年的持續發展，曾一度被英、德名校取笑的美國大學終於日益逼近了德國大學。

二戰後，「西部哈佛」斯坦福大學與加州公立大學系統的崛起，宣告了美國大學的全盛期。這種壓倒性優勢較此前的德國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之有今日的國際地位，在根本上源於其高端人才的優勢；而這又與其大學分不開。其大學之能有今日絕對領先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與其強固的大學制度分不開。好的制度，不僅可以營造優秀的學術環境，可以持續地培養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而且可以把他國培養的拔尖人才也吸納過來。其橡樹嶺、冷泉港、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等科研基地，便凝聚了各國成百上千的尖端人才；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外交關係委員會、胡佛研究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等久負盛名的「智庫」更是匯聚了全球高端人才，為美國的國際國內戰略決策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智力資源。有世界各國英才為之效勞，此國焉能不盛？

二戰前，日本大學被公認為德、英、美、法之外最好的大學。中國大學雖然起步稍晚，但在1930年代得到了長足進步。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大學的強勁上升態勢受挫。二十世紀後期以來，日本大學在很多方面已逐步衰退，中國大學則遭遇了重重困境。

亞洲是世界近代化進程中的後起者，其老牌大學多為民族危機的產物。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創建了東京大學；中國在戊戌變法時創建了北京大學。當時，中日兩國的大學和美國大學一樣，都曾是德國大學的積極效仿者。日本於1877年創建了第一所帝國大學——東京大學；為鼓勵競爭，又創辦了一系列帝國大學。它們都很快贏得了國際聲譽。在二戰前，日本大學被公認為德、英、美、法之外最好的大學。中國大學雖然起步稍晚，但在1930年代得到了長足進步。1930年，訪日歸來的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滿懷信心地宣稱中國大學有望在十年後趕上日本大學，二十年後超之^④。事實上，到抗戰前夕，中國有108所大學，略多於日本的半數；其中名校近30所，與日本相當^⑤；清華、北大的規模雖然不足東京大學的1/6，但水準已日益逼近該校，中央大學、協和醫學院等也已成爲世界級名校。但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大學的強勁上升態勢頓然受挫。自二十世紀後期以來，美國大學在各方面都領先於全球，日本大學在很多方面已逐步衰退，中國大學則遭遇了異常糾結的重重困境。

鑒於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且大學發展歷程有相似之處，本文主要以日本為鑒，來探究中國大學發展之道。

一 日本大學的得失優劣

日本大學之所以能夠上水平，與其自身特點有關。這其中有值得中國學習的一面，也有值得引以為戒的一面。

日本大學的優勢表現在大學自治、學術獨立、言論自由。其大學政策穩定，逐步形成了健全的制度體系。百餘年來，除二戰時期外，日本大學幾乎沒有因國內外任何重大的政治經濟因素受到大的影響，故其延續性非常好。一系列強固的社會制度、大學制度，使大學極少受行政因素干擾，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和個性化，允許不同聲音並存，相互攻錯，共同進步，避免極端化。

日本大學研究至上、寬嚴並濟。這種辦學導向促成了特定的風格：環境較寬鬆，要求較嚴格。寬鬆表現在：教師待遇與公務員相當；對教師只有對教學的考核，無剛性的發表論文的量化考核，但名校的高水平論文仍甚多；以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員地位高。大學自主招生，學生大都不分班級，代之以學生自治協會；專業教育與教養教育結合（雖然前者較弱勢），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研究生招考一律實行口試，對研究生沒有剛性的學分要求，也很少有發表論文的壓力（碩士生沒有發表論文的剛性需求，名校的博士候選人往往發表一篇論文後即可申請開題）。學生課程較少，教師有較充裕的時間開展研究和交流。在培養思路上，日本大學是「美國其形，德國其實」，較多地保留了歐洲古典大學放縱式的自由教育，不太強調競爭。所不同者，是歐洲大學少有應試教育弊端，日本則否。

當然日本大學也有嚴的一面：大學嚴守中立，嚴防政治勢力與商業因素進入校園；政、學嚴格分離，黨政力量難以干涉大學運作，大學教職員也幾乎不可能使大學成為從政、經商的跳板；嚴格把握職稱晉升；嚴格限制教師兼職，非常強調專業與敬業。在國立大學中，除理工等學科有一定的國家項目外，一般教師幾乎不允許接觸社會項目和兼職。教職員異常勤業，很少不加班。對學生，名校常要求掌握兩門外語；嚴格把握學術標準，很少有所謂「在職研究生」；博士學位標準尤其嚴格，絕不降格以求；學制較長（五至八年），且始終保持較高淘汰率。

日本大學理性務實，很少開展激進的改革。校長治校，職能明確。大學的自主權首先體現於校長，但亦非校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是由校務委員會行使職權。在行政性事務，校長有決策權；但在學術性事務，教授有發言權。

更重要的是，日本主要的優秀大學都始終倡導「研究第一」或「學術至上」的研究導向，並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體系。在此制度框架下，教學研究系統處於絕對強勢地位，管理（含行政、後勤等）系統則處於輔助的、服從的地位。自然，其行政系統也往往只具有較純粹的「服務」功能——而非「領導」功能，其本職工作幾乎就是給教員「打雜」。易言之，此時「領導」就意味着名副其實的「服務」，而不再是「宰制」。除極少數的校級領導外，一般行政職務並不擁有多少特殊資源，自然也不對教職員構成大的誘惑（或者反過來說，所謂行政領導，也很難對一般教授構成大的威壓）。通常說，只有學術成就才足以決定教員在大學內的地位。事實上，在不少學校，很多行政職務（特別是在中層和基層，如院系一級）都由內部有聲望的教授輪流擔當，每個人的任期都較短，而校長又往往從各學院（學部、研究科）的領導中遴選出來。在此環境下，很少有人能長期把持行政職務；也很少有人能夠在缺乏學術成就的前提下，僅憑藉行政手段就能攫取大量資源，謀取私利，侵蝕學術生態。這就確保了大學各類資源能夠高度集中於最能發揮效用、最能創造價值的環節：教學與科研。這對一個組織的生命力是異常重要的。

日本大學不太可取的一面則有：與歐洲大學少有應試教育弊端不同，日本大學課業負擔極重，學生注重應試和接受既有理念，懷疑精神、問題意識均被抑制。這對科學創造未必是好事。日本大學內部的「官」「民」問題雖然較淡，但與整個儒家文化圈一樣，日本整個社會仍有濃重的「官本位」傾向，致使人才分布失衡。日本各名校絕大部分畢業生都極度熱衷於公務員考試，相當一部分優

日本大學的優勢表現在大學自治、學術獨立、言論自由。其大學政策穩定，逐步形成了健全的制度體系。百餘年來，除二戰時期外，日本大學幾乎沒有因國內外任何重大的政治經濟因素受到大的影響，故其延續性非常好。

質生源被分流，這對研究生教育有負面影響。這一點在東京大學等尤其嚴重；日本民眾有着幾乎狂熱的「東大崇拜」，一旦有考上東大者，被認為光宗耀祖。這不僅意味着在升學中勝過了99%以上的同齡人，可以享受日本最優秀的教育，更意味着已經差不多奪得了躋身上流社會（尤其是官僚系統）的入場券。

日本大學高壟斷性，低競爭性。日本很少有大學排名，但處於領先地位的東大事實上形成了高度壟斷，尤其是在政、學兩界具有壓倒性的壟斷地位。次之為京都大學。京大在政、商方面不及東大，但囊括了至今日本1/3以上的諾貝爾獎得主，被視為關西學術殿軍。上述兩校與大阪大學、東北大學、名古屋大學等老牌帝國大學一起很大程度上壟斷了日本700多所高校的各類資源。以東大為核心的關東大學群，和以京大為中心的關西大學群，門戶之見極深，長期缺乏良性的學術互動且時有內耗。但二者在日本政、學、商各界各有山頭，派系分明。總體上，日本的國立大學處於絕對優勢。這種高壟斷性，造成低競爭性，對高等教育發展是不利的。

日本大學等級森嚴，注重資歷，流動性低。教職員薪酬主要依據年資，對能力與績效關注不夠，教師晉升非常緩慢，排資論輩，極少有四十五歲以下的文科正教授。這對許多有上進心、有才華的少壯派學人來說，難免形成某種壓抑。此外，本校本科畢業生，很難進入別校攻讀研究生。這容易影響生源的多樣性，抑制學術活力。

日本大學系統注重理工，偏好實用，法、商、醫、工等極為火爆，基礎研究則相對冷清。其實基礎研究不僅在學術上有基礎性意義，而且也有不可取代的實用價值。如在二戰中，英國就用數論破譯了德國不少密碼，直接箝制了德軍戰鬥力。至於雷達、核彈與航天、太空技術等尖端科技，也得益於數理化地學材料學等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的相對薄弱，勢必制約整個學術系統的可持續的強勁發展。

日本人口的老齡化日益嚴重，幾乎所有大學都已不同程度地面臨着生源匱缺的問題。為保持生源質量、提升本國的軟實力，日本注重吸納國際學生，文部省規定了各大學國際學生（特指攻讀學位者）比例的下限，並於2008年提出了「留學生30萬人計劃」。日本名校研究生中的國際學生比例多為一二成（但主要只能吸引亞洲生源，中國學生佔1/2以上），這略高於中國的幾所頂尖大學（均不足10%）；但明顯低於美國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一般超過20%）^⑥。

日本各類學生的就業境況非常之差。多年以來，其博士畢業生在畢業後一年內獲得正式職位者，比例非常低^⑦；其中未就業的只有部分幸運者能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短期資助（類似於博士後項目）。因此人們對於是否攻讀碩士、尤其是博士學位是非常慎重的。反過來說，真正讀研者，往往是有較強學術追求者；這批人的凝聚，強化了其學院氛圍。

由於日本高等教育的主幹是公立大學，因此對政府的財政依賴較深。近二十年來經濟的停滯，導致日本政府財政減縮，各國立大學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困難，一些相對冷門的學科（如中國學研究），在經費和編制方面都被相應地縮減。政黨政治是影響日本大學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內閣頻繁換屆，文教政策也隨之波動，資助力度時有浮動，制約了大學的穩步發展。

與歐洲大學少有應試教育弊端不同，日本大學課業負擔極重，學生注重應試和接受既有理念，懷疑精神、問題意識均被抑制。日本大學內部的「官」「民」問題雖然較淡，但整個社會仍有濃重的「官本位」傾向，致使人才分布失衡。

日本畢竟是島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及現實條件，使其民族性格缺乏安全感，相對排外。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經濟不景氣，致使日本各界普遍不歡迎外籍人才（哪怕極優秀）滯留日本與他們競爭日益稀缺的崗位。日本善於模仿一切先進科技，但非常在乎自身文化的純粹性，對其他文化不兼容，致使其文化缺乏多樣性；也難以吸引和接納他國人才在日本工作。日本極為注重細節與形式（如禮數），「日本製造」尤以精緻見稱。但凡事有兩面，過份沉溺於細節與形式的民族，其想像力、穿透力、原創力乃至活力是難免要受限的。這個曾經一度叫囂要超越美國的國家，始終沒有超越美國。1990年代，經歷經濟停滯後，日本才痛定思痛，意識到日美之間始終差一點甚麼。正因如此，無論是生源還是師資，日本大學都不足與美英最好的大學比肩（儘管其人口基數與經濟水平都超過英國）。日本對英語世界素極嚮往，但多數日本學者並非擅長英文，故強烈的「英語情結」始終糾結難消。

總之，日本高等教育的優點是大學獨立，受外部行政因素影響較小，學術自由、制度健全且較人性化、連續性好、勤業敬業；不足是等級制、「官本位」、壟斷性、應試教育、老齡化、高度依賴政府經費、國際化不足。這些因素決定了和決定着日本大學可以上水平，但很難在整體上躋身頂級水平。其學風可概括為：學習能力甚強而原創水準不足；確實優秀，但不夠卓越。日本1956至1973年的經濟增長率年均超過10%。1970年代世人預言「日本第一」；1980年代，日本也叫囂要「買下美國」；日語甚至一度取代西班牙語成為美國青年的第一外語。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神話」便危機環伺，整個1990年代成為「失去的十年」；低迷至今，則成為「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大學雖然獨立，但也與整個國家經濟，尤其是政府財政狀況休戚相關：當日本經濟態勢直逼美國時，它們也曾一度直逼美國頂尖大學；然在1990年代，經濟遭遇「增長的極限」後，大學也明顯疲軟，在與美英大學的競爭中，顯得不再強勢。

日本各界並非未意識到其困境。多年前，政府就提出「頂尖30計劃」，要在十餘年內使日本有30所大學進入世界前200名。但截至目前該計劃之實效迄未彰顯^⑧。耶魯大學校長雷文 (Richard C. Levin) 在2010年2月討論「亞洲大學的崛起」時，特地強調：「在1950至1990年間……日本經濟增長比美國快速，之後則較美國緩慢很多。……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創新是美國經濟能夠在2008年危機之前的二十年內迅速發展的原因。日本落後則正是因為它沒有創新。」在他看來：「打造一所真正傑出的大學並無甚麼固定模式。……但原地踏步的學校肯定會走向衰落。」^⑨日本長期習慣於東京大學的全球頂尖大學（前二十名）的地位。近些年來，該校的徘徊，也讓其高教界對本國大學的前景深感憂慮。

日本大學雖然獨立，但也與整個國家經濟休戚相關：當日本經濟態勢直逼美國時，它們也曾一度直逼美國頂尖大學；然在1990年代，經濟遭遇「增長的極限」後，日本大學在與美英大學的競爭中，顯得不再強勢。

二 三位一體的歷史鏡像：人才—大學—大國

所謂競爭，在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國際競爭尤其如此。只有具備了堅實的人才儲備，才可能使我們在國內的改革與建設、在國際戰略決策中立於不敗

之地，使我們的決策更積極、更有效，更具高水平。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處於不利位置。

從1997至2006年科學引文索引 (SCI) 數據庫發表的論文看，全球6,097位頂級科學家中，美國有4,016人，佔65.87%；中國排第十六位，有19人，其中大陸僅4人^⑩。全球頂級科學家中的華人，也多數在美國^⑪。雖然近年來中國政府推出的旨在大力引進高端人才的「千人計劃」使此現象有所改變^⑫，但短期內很難有根本改觀（印度則在前幾年已出現人才回流）。由於經濟、金融、科技、傳媒等領域的尖端人才大都在美國，這使其在政治、經濟、金融鏈條中處於頂端，有相當主動權隨時汲取全球資源。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則始終痛感尖端人才的缺乏。大學是學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最重要的基地，而要持續培養一批批的尖端人才，只能通過高水平的大學來承擔。沒有一流的大學，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一流人才，但一定意味着不會有拔尖人才的持續湧現。「一枝獨秀不是春，滿園花開才是春。」極個別的拔尖人才，意義是非常有限的。它不足以從根本上提升民族的創造力和國家的綜合實力，更不足以奠定一個民族百年、甚至數百年強盛的基石。

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始終痛感尖端人才的缺乏。大學是學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最重要的基地，而要持續培養一批批的尖端人才，只能通過高水平的大學來承擔。沒有一流的大學，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一流人才，但一定意味着不會有拔尖人才的持續湧現。

中國雖處於上升時期，但矛盾叢生、危機四伏的國際國內環境，事實上不容我們有絲毫所謂「太平盛世」的自得與虛驕。在正和乃至零和博弈中，半點的麻痹大意都是要不得的。在國內，我們已面臨諸多瓶頸；在國際上，我們仍處於國際經濟鏈的低端，這對長遠發展很不利。中國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從「中國製造」轉型為「中國創造」^⑬，而這關鍵就是「要借助強大的人力資本基礎……人才是關鍵，人力資本是關鍵。這對一個企業、產業和地區的興起，對一個國家的崛起都是根本」^⑭。

蔡元培曾言：「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黨派以外。」^⑮確然。但需要注意的是長遠的「戰略」不等於一時的「政策」。大學固可不遷就於某些一時之需，但不應該不服從於國家長遠的戰略目標（國際之政治）。這也是大學應有的現實關懷與擔當。尤其是在國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的非常時期，我們的教育（大學）也理應作出必要的回應。二者關係似仍可因時制宜地予以調適，默契配合：大學可以而且應該服務於國家的長遠戰略，國家也應該理解大學本身的邏輯，尊重辦學規律，不應越俎代庖，操之過急。行政有行政的邏輯，大學也有「大學的邏輯」。以行政手段辦大學，或可湊某些一時之「近功」，但未必能求得「遠效」。而惟此「遠效」，才足以確保一國長久的強盛。

中國大學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曾經獲得跨越式發展並蜚聲國際，建成了若干所世界級名校。但在1952年開始的院系大調整中，全盤蘇化、高度行政化的辦學體制，直接制約了中國大學的發展，使之很快與當年同為德國大學效仿者的美日大學之間形成了質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不得不重走回頭路，接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大學傳統，力爭融入國際主流。在1980年代，我們缺乏合理的國家戰略，大學的重要性並未真正得到體認。由於沒有在國際視野內來明確大學定位，以致將目標局限於「社會主義一流大學」，僅僅以蘇聯大學為潛在的競爭目標，但我們常常忽略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我們當時所設定的那些競

爭對手，本身就很少被認為是國際主流學術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持續的經費緊缺，直接制約了大學發展，挫傷了學術工作。在1952至1990年間，中國大陸高校在《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上的論文發表量可能為零。只有到了1990年代，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所有這一切，都與中國的綜合國力遠不匹配，更與中國的長遠戰略目標不相適應。

在歷史的關鍵點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舉措，其中尤值注意的是「211工程」與「千人計劃」等。「985計劃」尤其受國內外矚目。該計劃實施已逾十載，對其實效，國外人士多所肯定，而國內則褒貶不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業內人士幾乎都公認，近些年來香港的大學(如香港大學)、台灣的大學(如台、成、清、交)等都在穩步發展之中；而北大、清華與二者的差距是在逐步縮小，而不是在擴大；曾明顯領先於上述兩校的台大，優勢已不再明顯。同樣在穩步前進的還有整個「985」項目的三十八所大學。據此可見，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最好的一批大學始終保持在一定水平線以上，尤其是科研水平確實有了明顯提升；在個別學科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國際水平。

當然，中國大學的總體水平尚未獲顯著提升；即便是若干所旗艦大學，也只達到美國一般公立(州立)研究型大學的水平。1991至2009年，中國大陸高校作為第一作者單位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的論文，合共只有89篇；而1999至2002年間哈佛大學在讀博士生在《自然》和《科學》上就分別發表論文203、184篇^⑥。所幸的是，事情正在起變化。從1995至2005年，中國學者在主要科學、工程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增長了四倍。只有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發表量多於中國^⑦。到2009年，中國科研論文數量已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⑧。但令人遺憾的是，截至目前中國大學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仍未有大的提升，我們仍缺乏有高度原創性與國際影響力的成果，當然更缺乏世界級的思想領袖與學術大師。

大學的發展亟需國家層面的支持。因此，新近出台的〈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確實是非常迫切的，極為必要的。把「一流大學」的訴求正式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把對傑出大學的追求上升為國家意志，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有關部門以此正式徵詢全社會的意見，以圖群策群力玉成此事，這也是罕見的。所有這一切，不可能不讓人有所深思、有所期待。當然，這種期待的基點就是對中國大學的歷史與現狀進行較系統的認識，以求得較中性的判斷。

近十年來中國大學的改革，已基本解決了「大眾化」的問題，但在「提高」方面則尚有不足。質的突破、結構的優化升級，比量的增長更重要，但也更艱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國的得失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於此，德日等國經驗教訓值得玩味；美國經驗亦堪借鑒。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把大學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繫起來，但在德國和日本，政府的力量似乎過強，市場的力量過弱，從而造成了兩國大學高壟斷、低競爭的格局。這就很難形成一個寬鬆的、可持續的、強勁的創新系統。在當今日益慘烈的、「不進則退」的國際競爭中，其大學也就很難避免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反觀美國，在相對成熟的市民社會的平台上，市場力量在大學的發展中佔據主

近十年來中國大學的改革，已基本解決了「大眾化」的問題，但在「提高」方面則尚有不足。德日等國經驗教訓值得玩味；美國經驗亦堪借鑒。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把大學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繫起來。

導作用；政府則以社會需求刺激大學發展，通過對各門類學科高端知識產品的購買，為大學創造了知識創新的市場，從而一方面確保了大學的學術自由與自由競爭，另一方面有效地引導大學的發展與國家戰略的需要相適應。

讀史明智。前述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但需要注意的是：一、美國大學的發展之路已被證明是一條比較有效的道路。美國經驗必須借鑒，但未可照搬。關於這一點，就連美國的不少教育家，如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也反覆強調^⑨。對我們而言，美國經驗最值得借鑒的方面之一，也許不是其中某些具體的策略，而是他們在對「美國之路」的艱苦探索中所展現的勇氣、智慧和原創精神。無疑地，這對我們探索「中國之路」具有特殊的意義。二、雖然國外個別高校的發展，確實有過「跨越式」歷程；但一般地說，傑出大學的建設具有長期性。中國大學個別旗艦大學，在特定條件下，確實可能領先地達到較高水平。但一個高水平大學群的建設，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而這不是「十二五」規劃的短短五年所能夠完成的；甚至也不是上述兩個〈綱要〉所規劃的十年所能完成的。即便最樂觀的估計，一個世界級大學群的建成，至少也需要二三十年的持續努力。

中國大學的治理，需要「內行」的領導，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更需要內外兼修：除了大學本身的辦學理念、治理結構、師資生源與時俱進外；還需要基礎教育、高考制度、戶口制度的改革、其他相關的宏觀政策的改革，以及政治體制的改革。

三 結論

中國大學和整個中國社會一樣，面臨着現代化的艱巨任務。愈是後發的現代化進程，往往就愈是艱難。這是後發劣勢。但也有後發優勢：一是能以史為鑒，從前人成敗中獲得後見之明，用別國經驗教訓來代交學費，少走彎路。德日等國大學的遭逢，也足已啟人深思。德日等國多屬政府主導型現代化，政府較強勢，效率高，動員能力強，這在非常時期是有特殊意義的，但在正常時期也會妨礙社會的自主性，妨礙自由競爭，妨礙協調發展，制約學術生態的全面茁長。二是歷史負累較小，可塑性較強。為了將現代化建設縱深推進，為了在國際博弈中不受制於人，我們必須盡速培養大批的高端人才。而這就必須充分發揮優勢，創造一切有利條件，盡速建成一批世界級大學。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大學本身的問題，也不過是社會問題的縮影，大學從來不是遺世獨立的象牙塔：現代社會方方面面的觸角往往都要延伸到大學圍牆之內，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勢必直接或間接地投射到大學中來。因此，僅僅就大學來看大學是不夠的，就大學來治大學更是不夠。正如「三農問題在三農之外」一樣，「大學問題在大學之外」。中國高等教育中許多癥結往往是宏觀的社會政策、社會環境所致。在破解大學難題、實現「去行政化、自主辦學、學術自由、非功利化」時，僅僅靠大學本身的努力，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實現的。

在某種意義上，影響大學發展的因素，幾乎和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變量因素一樣多。但事在人為。中國大學的治理，需要「內行」的領導，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更需要內外兼修：除了大學本身的辦學理念、治理結構、師資生源與時俱進外；還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包括基礎教育、高考制度、戶口制度等，包括其他相關的宏觀政策的改革，甚至也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可能有改革的真正成功。

註釋

- ① 參見李工真：〈德國大學與德意志現代化〉，載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編委會編：《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頁50-58。亦見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② 陳中原：〈諾貝爾走向世界的步伐〉，www.hz4z.net/jyzx/%D0%C5%CF%A2%BF%E2/paper/culture/vision/shiye110.htm。
- ③ 參見閔維方：〈以改革開放精神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中國教育報》，2009年3月31日，第1版。更詳細的研究，參見馬萬華：《從伯克利到北大清華——中美公立研究型大學建設與運行》（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頁12-64。
- ④ 蔣廷黻講，文翰記：〈遊日見聞〉，《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205號，1930年9月25日，第2版。
- ⑤ 參見董寶良主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頁437-520。
- ⑥ 日本方面，參見<http://goabroad.sohu.com/s2009/jp300000/>的「出生國(地域)別留學生數」、「接收留學生較多的大學」，亦可參見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9-03/17/content_17455187.htm；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12/07/content_16911323.htm。現今中國大陸的頂尖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東五校（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其留學生數可參見相關各校網站的詳細統計資訊。美國方面，參見www.liuxueguihua.com/view.aspx?nid=14&id=202。
- ⑦ 〈2011年日本大學畢業生形勢仍將嚴峻〉，共同網，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toryid=76662%26sel_lang=tchinese。
- ⑧ 對日本大學改革的最新進展，可參見Japan Higher Education Outlook, <http://japanheo.blogspot.com/>。2000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出了「50年內產生30名左右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目標。1949年至今，日本共有16人獲獎，其中2000至2008年間有8人。日本始終保持非歐美地區的最前列，超過華裔獲獎者總和。參見苗允：〈日本的諾貝爾獎戰略〉，《前沿科學》，2009年第1期，頁86-87。
- ⑨⑩ Richard C. Levin, "The Rise of Asia's Universities", 1 February 2010, Yale University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http://opa.yale.edu/president/message.aspx?id=91>。
- ⑪ 烏雲其其格等：〈我國高層次科技人才回歸不足現象及原因分析〉，《學習時報》，2008年12月15日。據國際通行的ESI指標體系所劃分的二十二類學科，其中各學科論文引用頻次居全球前250名上下者，一般被認為是本領域的全球頂級科學家。
- ⑫ 參見〈頂級雜誌華人科學家龍虎榜〉，無憂論文網，www.51lw.com/lxw/clwllw/19817.html。
- ⑬ 從目前看，「千人計劃」和中國教育部同期的「公費留學生計劃」一樣，無論是規模還是力度，在近代以來的中國都是空前的。「千人計劃」事實上主要針對的是在世界前100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中青年。
- ⑭ 胡祖六：〈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市場報》，2006年3月3日。
- ⑮ 胡祖六：〈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關鍵在IP〉，《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9月8日。
- ⑯ 蔡元培：〈教育獨立議〉，《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頁22-23。
- ⑰ 印杰：〈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兩大注意〉，《中國教育報》，2008年10月30日。
- ⑱ 〈外媒稱中國科研論文數量劇增 僅次於美國〉，中國新聞網，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1-03/1944717.shtml。
- ⑲ 陳廷柱、姜川：〈阿特巴赫教授談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大學教育科學》，2009年第2期，頁5-8。